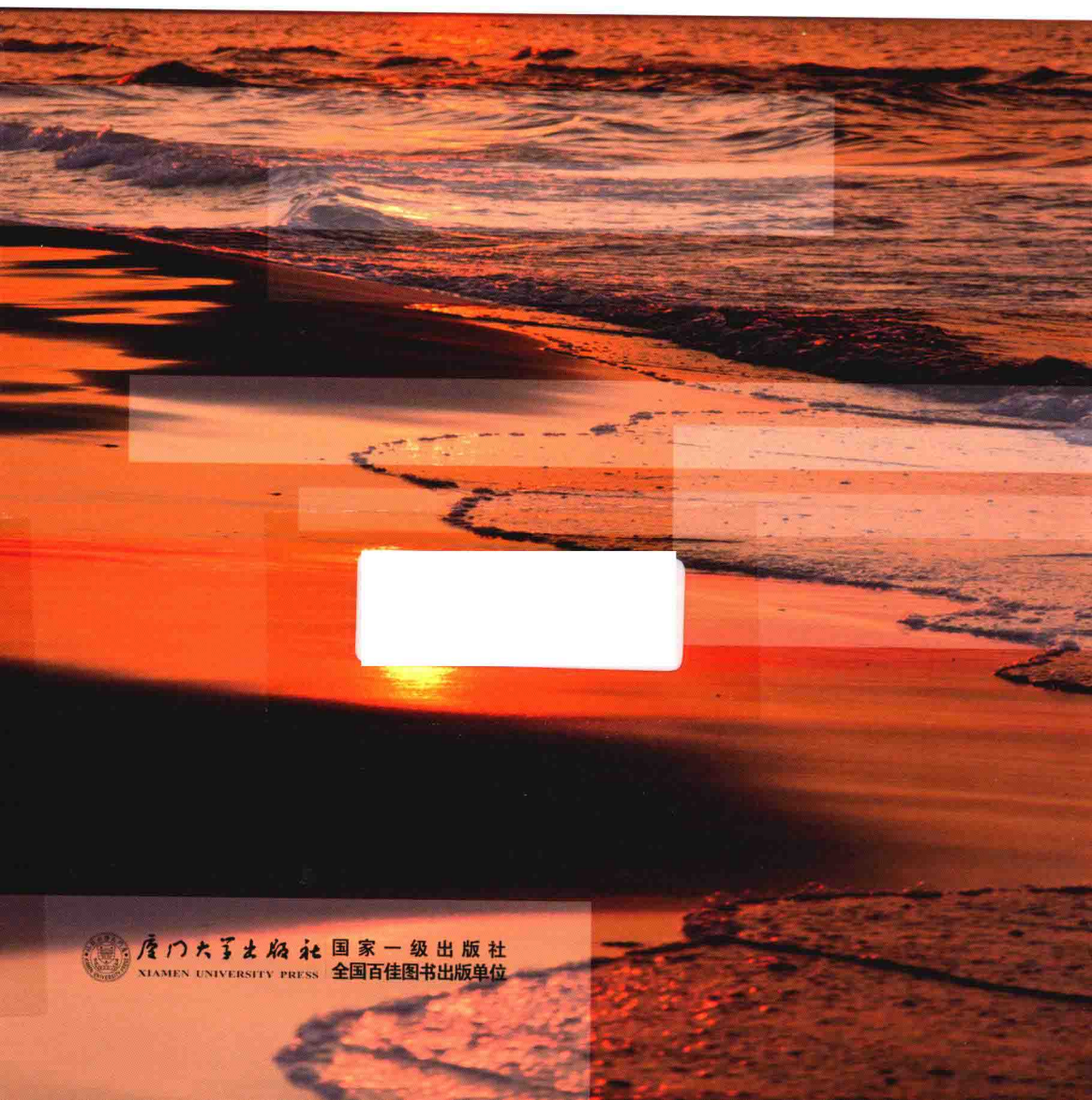


林朝霞 ◆ 著

当文化遇上经济：

福建文化产业发展思维与路径

When Culture Meets Economy:
Development Thinking and Path of Fujian Cultural Industry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当文化遇上经济： 福建文化产业发展思维与路径

When Culture Meets Economy:
Development Thinking and Path of Fujian Cultural Industry

林朝霞 ◆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文化遇上经济:福建文化产业发展思维与路径/林朝霞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615-5845-4

I. ①当… II. ①林… III. ①文化产业-产业发展-研究-福建省 IV. ①G127.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9761 号

出版人 蒋东明

责任编辑 王鹭鹏

装帧设计 李嘉彬

责任印制 朱 楷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253(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ress@126.com

印 刷 厦门市明亮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15.75

插页 2

字数 298 千字

印数 1~1 500 册

版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源起和文献综述	1
第二节	基本概念和理论依据	6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	14
第二章	文化产业:当文化遇上经济	17
第一节	文化产业的四大谜题	17
第二节	文化产业的全球化浪潮	26
第三节	文化产业的内在奥秘	30
第三章	生态理念下文化产业发展新思维和新范式	37
第一节	生态理念下文化产业发展新思维	37
第二节	生态理念下文化产业发展新范式	40
第四章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56
第一节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概况	56
第二节	中国文化产业存在问题	61
第五章	福建文化产业 SWOT 分析	68
第一节	福建文化产业的发展优势	68
第二节	福建文化产业的发展劣势	73
第三节	福建文化产业的发展机遇	76
第四节	福建文化产业的外在挑战	78
第六章	福建历史文化与产业路径研究	81
第一节	福建历史文化发展概述	81

第二节	福建文化资源开发优势	84
第三节	福建文化资源开发现状	87
第四节	福建文化资源开发路径新探	91
第七章	闽都文化与福州产业经济定位	94
第一节	闽都文化	94
第二节	闽都文化产业现状	104
第三节	福州文化产业发展定位与路径	107
第四节	三坊七巷:文化品牌的整合提升	112
第八章	闽东文化与宁德产业经济定位	122
第一节	闽东文化	122
第二节	宁德文化产业现状及问题	130
第三节	闽东文化产业发展定位与路径	133
第四节	葡萄沟:田园经济的未来空间	137
第九章	莆仙文化与莆田产业经济定位	142
第一节	莆仙文化	142
第二节	莆仙文化产业现状	151
第三节	莆田文化产业发展定位与路径	156
第四节	湄洲岛:妈祖文化符号的提炼升华	158
第十章	闽南文化与厦漳泉产业一体化定位	165
第一节	闽南文化	165
第二节	闽南文化产业现状	179
第三节	闽南文化产业一体化发展定位	185
第四节	厦门:数字经济的延伸拓展	187
第十一章	闽北文化与南平产业经济定位	196
第一节	闽北文化	196
第二节	南平文化产业现状	205
第三节	南平文化产业发展定位	208
第四节	下梅:千年古村的前世今生	210

第十二章	闽西文化与龙岩、三明产业经济定位	215
第一节	闽西文化	215
第二节	闽西文化产业现状	220
第三节	闽西文化产业发展定位	222
第四节	永定土楼:门票经济的发展转型	224
第十三章	闽台区位优势与文化产业发展	236
第一节	闽台区位特点	236
第二节	闽台文化空间布态	238
第三节	闽台文化整合与开发的历史意义	240
第四节	闽台文化产业发展瓶颈与策略	241
后记		247

第一章

绪 论

文化产业是机器复制时代的新兴产物,具有工业化、大众化、娱乐化、商品化等特征,使昔日高不可攀的高雅艺术进入寻常百姓生活,带动文化消费热潮的到来。文化产业不仅关乎国家经济发展,而且关乎民族文化主导权,因此越来越受到国际学界的重视。但由于文化产业研究兴起时间短,成果不如传统学科丰富,且文化产业本身处于快速发展期,焦点转换频率较快。截至目前,关于福建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的论著已有不少,但理论探索相对不足,且在区域实证研究上亟须跟进。

第一节 研究源起和文献综述

一、研究源起

文化产业方兴未艾,文化产业研究亦不足百年,与其他人文学科动辄千年的历史相比固微不足道,但半个多世纪以来也经历了由贬及褒、由西渐东、由边缘到中心的延宕与波折。

文化产业的兴起与机器印刷、电影成像技术等兴起密不可分,它悄然冲击了传统审美习惯和高雅艺术的地位,机器复制、娱乐大众的商业运作模式更是一点一滴地消解神圣光环、崇高理想、自由意志、高雅情操和批判精神,使少数文化精英的艺术追求化作平民化的娱乐盛宴。因平民性、娱乐性、商业性特征,文化产业很快引起敏感而多思的人文知识分子的警惕、担忧和批评,文化产业研究由此拉开帷幕。“文化产业”一词最早出现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是文化工业的代名词,蕴含了批判现代性和

守望传统文化的哲学意味,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产业抑或大众文化的批判延续了尼采、加塞特和艾略特等人的人文之思,主要站在精英主义和意识形态批判的立场上发出声音。首先,他们认为大众文化以廉价的触手可及的娱乐消遣消解了精英文化。阿多诺批判大众文化的商业性,认为“艺术大言不惭地放弃了自身的自主性,并且在形形色色的消费品当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地方……艺术就像是工业产品,专供人们在市场中行销与交换”^①。霍克海默批判大众文化的低俗化,他在《艺术与大众文化》一书中提出,大众文化消弭了“纯真艺术”的批判精神和乌托邦理想。马尔库塞主要批判大众文化的同质性,利维斯批判大众文化的反传统、反道德性,其《大众文明与少数文化》一书中提到,“人世间的宗教为之急速改变,家庭为之崩溃,社会风俗为之丕变”^②。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也认为,大众文化带动享乐主义之风,颠覆了以新教伦理为主体的传统价值观念。其次,他们认为大众文化隐含资本主义权力运作机制,娱乐异化取代劳动艺术,导致市民社会的消解和公共领域的泯灭。米尔士在《权力精英》一书中指出,大众社会意味着市民社会的衰退,信息灵通而深具批判态度的“公众”为被动无依的“大众、乌合之众”所取代。阿多诺在《文化产业再思考》一文中认为:“文化工业刻意地由上而下,借着一种意识形态将消费者收编进去,而这种意识形态就是让人以顺从代替主体意识,压根不允许人脱离规范而存在;文化工业的整体效果是违反启蒙原则的……文化工业不断地以科技作为支配自然的工具……它是一种桎梏意识的手段。文化工业阻碍了个人的发展,个人无法以独立自主的态度,有意识地为自己决断事务。”^③

同属法兰克福学派的本雅明却对文化产业持乐观态度,他于1936年出版《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歌颂机器复制的文化潜力和走下神坛的平民艺术,描绘了从技术进步到艺术进步再到社会平等进步的演进轨迹,带有技术乐观主义倾向。斯特里纳蒂认为:“本雅明强调了当代通俗文化的民主潜力和参与潜力,而不是独裁主义的潜力和约束的潜力。”^④斯道雷也提出:“本雅明褒扬‘机械复制’的积极潜力。他认为,‘机械复制’开启了从‘灵光’

① [英]阿兰·斯威伍德著,冯建三译:《大众文化的神话》,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1页。

② [英]阿兰·斯威伍德著,冯建三译:《大众文化的神话》,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页。

③ [英]阿兰·斯威伍德著,冯建三译:《大众文化的神话》,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3页。

④ [英]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著,阎嘉译:《通俗文化理论导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96~97页。

文化向‘民主’文化发展的进程。”^①此外,席尔斯在《知识分子与权力》一书中批驳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悲观看法。贝尔在《作为大众社会的美国》一文中认为,消费资本主义利于文化分层,进而有助于多元、民主文化的诞生。科恩豪泽在《大众社会的政治》一书中认为,大众文化利于自由、民主社会的建构。麦奎尔在《朝向大众传播社会》一书中认为,大众文化的共享性优于古典文化。

随后,马克拉伯、恩泽斯伯格、赫伯特·席勒、阿芒德·马特拉特等诸多学者也参与了该讨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文化产业在西方的蓬勃发展,文化产业的负面评价日趋减少,变成中性词。不少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发生偏移,将下里巴人的通俗艺术作为重要的文化现象加以研究。威廉姆斯反对安德森和柯林斯的精英文化立场,认为文化产业前景广阔,不应以含有贬义意味的“大众文化”来冠名,应以“流行文化”替代它。汤普森也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提出,大众传媒有助于化解文化霸权和提高平民教育水平。到了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文化产业更多地带有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形态转型乃至民族国家复兴的神圣意义,成为政府机构、国家智囊、行业协会、商业机构、学界学者竞相关注和研究的领域,其褒义内涵逐渐加强,产业经济、管理科学、后殖民主义、文化霸权研究等均关注这一新兴业态。

中国文化产业起步较晚,几乎是近二三十年的事,受西方文化和经济思潮影响较大,具有后发性、模仿性等特点。该研究领域更多地洋溢着跑马圈地的学术激情,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的纷纷介入使之成为众声喧哗的学术场,充满了炫目的创意和飞扬的想像力,但似乎少了些许学术沉思和哲学漫步,亦少了些许自由意志和批判精神,我们姑且称之为“走在红尘中的学术”。

时下,中国文化产业研究呈现出如下特征:

首先,理论探索不足。各类国家基地、产业中心、评估机构蜂拥而起,各种研究专刊、评估报告此起彼伏,但许多研究成果成为时效性掩盖下的急就章,理论跟风、写作套路化问题较为明显。与传统学科相比,文化产业研究不甚追求深度模式,在对策性和应用性的专注中相对忽略理论探索,或者直接引入西方理论体系,对其理论的适用性思考有限。

其次,统计标准失范。文化产业概念混杂,内涵和外延不明晰,统计标准和口径不一致,导致统计数据参差不齐,成为学科研究的一大瓶颈,尤其是文化产业所属子范畴尚未统一,与国外版权产业、创意产业抑或内容产业的对应关系难以厘清,由此存在基础概念、统计标准混沌不清的问题。各级统计

^① [英]约翰·斯道雷著,杨竹山等译:《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页。

局并未将文化产业列入与工业、建筑、金融、制造等相当的统计门类。文化产业统计数据较多来源于国家各大分支机构、行业协会或研究机构,统计权威性不足,且信息部、文化部等在统计上多有交叉,使得文化产业研究对象不够明确,相应的对策分析成了建在沙堆上的城堡。文化产业研究的学科梳理和学术沉淀成为当务之急。

最后,实际价值有限。文化产业学科建设较晚,研究团队多由传统学科转型而来,学术深化尚需时日,且以学院派为主,对产业的了解和介入程度不高,影响了对策研究的落地性和对产业发展的引领性。

因此,目前文化产业研究的重点应放在理论探索、行业标准确立和地域性对策研究上。具体而言,第一步是建构宏观价值体系,第二步是在宏观价值引领下探究具体的发展路径,第三步是分析区域产业发展现状,探索具体的发展步骤、策略和措施。

二、文献综述

福建文化产业发展思维与路径研究属于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研究。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是提振国家经济实力和软实力重要引擎,是文化产业研究的热门选题。但是以福建文化产业发展为重点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缺乏整体性、重量级的论著,与福建乃至海西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重要性不相匹配。

国外学者较早关注区域抑或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常把它与区域定位、城市规划和国家形象塑造等连为一体,形成理论与实证这两大研究侧向。首先,国外学者擅于对经典案例和统计数据进行提炼分析,发现经济发展的内在结构和核心动力,积极探求产业发展的深度模式和动力机制。查尔斯·兰德里提出七要素理论,认为城市的创意水平取决于人员素质、意志和领导者能力、人才多样性、组织形态、强有力的地方认同、城市空间设施及网络联系、组织结构这七大要素。格莱泽提出 3S 理论,认为技能(科学基础)、阳光(自然生态)和城市外拓(城乡相结合的布局)是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理查德·佛罗里达提出 3T 理论,即科技、人才资源和多元的包容性是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制胜法宝。其次,国外学者和诸多研究机构也致力于城市或区域文化产业的实证研究,如澳大利亚智库“2Thinknow”长期关注城市创新能力,从 2007 年开始发布《全球创新城市指数》,对全球 331 个城市进行创新指数评估。美国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联合发布《2013 全球创新指数报告》^①,对全球 142 个经济体的创新能力

① 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

进行评估。

我国区域文化产业研究整体起步较晚,特点如下:

其一,近五年来该领域研究成果呈井喷态势,成为文化产业研究的焦点话题。其中不乏扛鼎之作,如喻文益、向勇的《区域文化产业研究》,花建的《区域文化产业发展》,马萱的《我国区域文化产业竞争力研究》,李世举的《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研究:基于辽宁省的考察》,韩美群的《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与模式研究》,万程成的《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我国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研究》等。

其二,较为依赖西方批评话语,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W. 钱·金的蓝海战略理论、杰恩·巴尼的 VRIO 理论等文化产业研究理论在中国均有较大影响力。祁述裕的《中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和若干建议》、赵彦云的《中国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和分析》、李高业的《文化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提升》在区域产业竞争力评估体系建构上明显受到波特“钻石模型理论”的影响。王岚、赵国杰的《基于 ANP 的地区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模型与指标体系》借鉴了美国匹兹堡大学托马斯·塞蒂教授 1996 年提出的网络分析法,建构区域文化产业评价体系。李雪茹的《区域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分析:基于 VRIO 模型的修正》批判性地接受了杰恩·巴尼的 VRIO 理论,对区域文化产业内在竞争力进行评价。马萱的《我国区域文化产业竞争力研究》以产业效率为标准分析我国 31 个省的文化产业竞争力水平,明显受到波特“竞争理论”的影响。李玉杰的《基于恩格尔定律的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策略》借助恩格尔定律分析区域文化产业发展重点。

其三,区域文化产业的实证研究悄然崛起。李宜春的《省域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初探——以安徽省为例》,李程骅的《南京都市圈文化产业竞争力研究》,靳晓婷的《基于因子分析的河南省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朱小平的《长三角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差异及潜力研究》,朱智文的《甘肃省区域文化产业竞争力比较分析》,吴保华的《新疆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模式与制约因素初探》等聚焦特定区域的文化产业发展现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其中,福建区域文化产业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宏观研究成果包括杨中启的《提升海峡西岸经济区文化软实力研究》、吕清贵的《试论海峡西岸经济区文化产业发展》、董巍的《海西文化产业原真性保持与价值传导》、刘桂茹的《闽台文化产业互补性初探》、刘小新主编的《闽台文化产业合作:经验与问题》、许彩玲的《闽台文化产业竞争力比较研究》、吴声怡的《福建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研究》等,虽然提出海峡文化创意产业带、海峡文化圈及闽台优势互补等诸多构想,但大多浅尝辄止,未做深入系统研究。微观研究成果

有张宝英的《论区域金融视域下的闽台文化产业对接》、郑巧《闽台文化产业人才资源合作开发战略研究》等,主要探析闽台文化产业合作中的金融创新、人才培养等问题,研究广度和深度都稍嫌不足。

第二节 基本概念和理论依据

一、基本概念

(一)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简而言之就是精神生产和符号加工,与物质生产和实体经济相比,劣势是不见实体,相对虚渺,优势是高附加值与可复制性。当物质资料相对匮乏的时候,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求的物质生产应是经济主体;当物质资料相对饱和的时候,满足人类精神需求的文化生产就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早有研究资料显示,人均 GDP 达到 3 000 美元时,物质需求因边际效应逐渐下降,精神需求则有锐升趋势。不论是世界超级大国美国,抑或是“曾经的世界工厂”英国,还是战后实施文化复兴国策的日本、韩国,纷纷将文化产业作为实现经济蓝海计划的重要依托,充分利用文化产业高附加值、高融合度、强渗透力和强跨越性的特性,辐射服装、电玩、汽车、电子设备等邻近产业,产生巨大的经济提振和产业拉动效应。换言之,文化产业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阿基米德杠杆。以日本动漫产业为例,它从动漫制作延伸到影视广播、网络游戏、报刊、手机出版等周边产业,又延伸至电动玩具、服装用品、食品、主题公园等交叉产业,继而带动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具体见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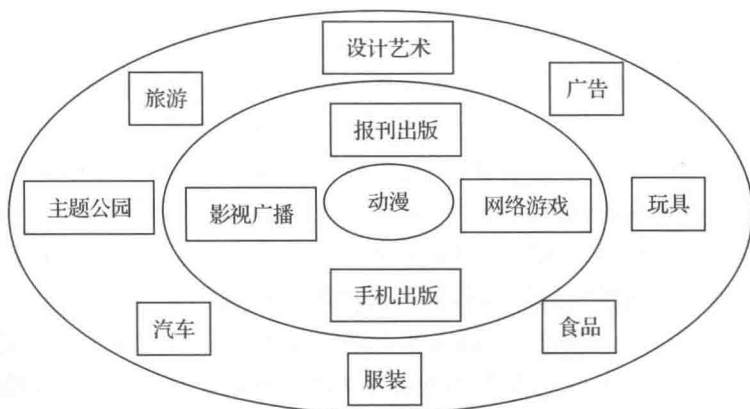


图 1-1 日本动漫产业链图示

从本质而言,文化产业属于创意型经济,区别于资源型和劳动力型经济。

资源型经济会因资源的损耗和枯竭而告罄,劳动力型经济则只能停留在经济链的末端,只有创意型经济才属于未来。

(二)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的文化社会学概念,被用于探析文化潜在的经济利益和权力意志。布尔迪厄认为,文化生产的本质是生成利益和权力运作。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基础,一方面提供人们相互理解、交往和参与社会实践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是生成权力与利益支配的生生不息的源头。^①

文化资本是社会学中“文化”和经济学中“资本”概念的有机组合。对它的有效阐释须要引入另一概念——文化资源。文化资源是人类历史和社会实践所遗留的有形或无形文化。文化资本则是资本化的文化资源,即能够产生价值增值的文化资源。文化资本是“能带来价值增量效应的文化资源,或指以财富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的积累”^②。

(三)自然成本

自然成本,又称耗竭资产,是人类物质生产过程中重要的成本投入,包括自然资源损耗和自然环境污染。半个世纪以来,自然成本概念兴起并受到关注。人类对经济增长、物质财富的嗜欲导致了原生性资源枯竭问题和水、大气、土壤等环境污染问题,不仅引发有识之士的人文忧思,也引起经济学家对自然有序管理和合理开发的理论探索。保罗·霍肯的《自然资本论》被誉为“下一次工业革命”的圣经,将资本分为实物、金融、人力和自然这四个方面,强调自然要素对经济的贡献。1968年,约翰·戴尔斯最早提出排污权和排污权交易概念,将排污权纳入企业成本,试图通过经济杠杆对污染物排放进行有效科学的管理,促进企业节能减排、技术革新或产业升级,开启了环境经济学的先河。排污权交易理论后来被美、德、澳和英等国普遍采纳,使得环境资源管理市场化有效落地。

(四)社会成本

社会成本是指生产活动给社会带来的污染和侵害等。该理论首倡者是英国经济学家庇古。他提出用税收杠杆调节侵害社会之生产者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差距,即根据生产者社会危害程度征税(庇古税),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罗纳德·哈里·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因经济自由

^① 张怡:《文化资本》,《外国文学》2004年第4期。

^② 施炎平:《从文化资源到文化资本》,《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6期。

主义理念影响修订了庇古税制,主张以市场调控方式完成社会成本交易,因此获得 1991 年的诺贝尔经济奖。

(五)文化地理学

文化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范畴下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文化与地理生态的关系、文化生成与地域特征、文化渗透与区域联系等,对透析历史文化的生成环境、明确文化资源的空间布态以及检测地域发展文化产业的合理性都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文化地理概念和生态理念有共通之处,均注重地理的先天性,又注重文化的渗透性,以求发挥地域优势,改善地域环境。

二、理论依据

本书以生态理论为主要依据,探讨文化产业的生态发展策略和途径,用于指导福建文化资源保护和产业发展。

生态理论的兴起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思想革命。影响之深,几乎撼动了人本主义的绝对合理性;影响之大,几乎成为妇孺皆知的日常术语;影响之广,几乎遍及哲学、美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各个领域。虽然生态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的源头,如老庄哲学、天人观念、易经思想、佛陀思想等,近代浪漫主义又充实了其内涵,涌现出华兹华斯、卢梭、梭罗等无数浪漫诗人,但是它形成理论体系并被普遍接受却是 21 世纪中后期的事情。

生态理论是全球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背景下因生态环境问题而逐渐凸显出来的新兴学科。它以思考人与自然之关系为核心,带有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和市场拜物的特征。生态理论的诞生是人类观念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革命。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几乎是数千年来西方世界的至理名言,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关系早已注定。西方文明的两大源头是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前者关注人类社会内部的关系问题,18 世纪的启蒙运动依旧延续着其关于民主、自由的思考,19 世纪马克思认为希腊文明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参照,把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伟大成就作为人类自由发展的重要基础。后者关注人与神、命定的关系,人须敬畏上帝,但上帝也赋予人统治万物的权利,《创世纪》里上帝让亚当充当自然的管理者、万物的牧羊人,“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种行动的活物”,人与自然始终处于二元对立的关系之中,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几乎不曾撼动过。然而,生态理论改变自然的失语状态,把自然生态保护作为人类自身发展的重要命题,重新思考和定位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

(一)生态理论的特点

生态理论以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为宗旨,从思维、情感、行为方式上与主体性哲学相决裂。生态学者们纷纷提出自然中心主义、地球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乃至生命中心论的价值观,以取代人类中心主义,格洛特·费尔特指出“生态批评对文学研究采取了一种以大地为中心的态度”^①,罗尔斯则主张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准则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具体而言,生态理论主要体现为:

其一是思维方式的革命。生态理论是后现代语境下人对自我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和重新构建。它打破了物我对立的思维方式,从生态链、生态群落的角度来看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体现生生不息的生态哲学理念。一方面,用系统论取代认识论,从维护生态和谐运转和生态群落多样性的角度来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放回自然,作为自然的重要一环,改变人与自然森然对立的关系,保证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以自然生态之理看待人类文化生态,秉持文化有差异但无优劣的观念,宣扬文化平等主义,维护文化生态的丰富性、多元性和互补性。

其二是情感方式的转变。生态理论应打破古典美学主客之间观照与被观照的关系,以生存与体验哲学为依托,建构人与自然平等对话、和谐共处的主体间性情感模式。在这种情感模式下,人不再是宇宙的中心或尺度,而是天、地、人、神、物众多“存在”中的一维,也不再把自然当作可以肆意改造和掠夺的客体,而把它作为人生存、体验和对话的另一个存在,对自然存有理解、同情和敬畏之心。

其三是行为方式的改变。生态理论不仅要在思维方式、情感方式上与古典美学决裂,而且要树立全新的行为理论,确立后工业化时代人介入自然的行为准则。人类固然必须从自然界汲取物质资源来维持和改善生存环境,但这必须以维护生态系统和谐运转为前提,应对人的欲望需求加以节制,促进人与自然形成多元并存且相互补益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组织、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将关爱自然和守护地球这个共同家园作为个体或集体行动的基本准则,反对过度生产、消费和破坏行为。

(二)生态理论的多学科运用

奥尔多·利奥波德 1949 年出版的《沙郡年记》被学界普遍认为是生态书写的源起。蕾切尔·卡逊 1962 年在美国发表《寂静的春天》一文,写了杀虫剂

^① 王宁:《新文学史》,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11 页。

对浮游生物、鱼类、昆虫、鸟类乃至人类的群体性危害,正式吹响生态环保的号角,迫使 DDT 及其他各种剧毒杀虫剂最终退出人类生产和生活领域。富有嘲讽意义的是,DDT 曾使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农业生产大幅增长,使 500 万人免于饥饿威胁,并在控制疟疾与伤寒上发挥奇效,米勒也因研发 DDT 给人类带来福音而荣获诺贝尔奖,而在此后 30 年内,千百万吨 DDT 被视为无害农药大量使用,抗药性、不可降解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DDT 通过食物链最终转移至人类体内,导致肝损害和脑功能紊乱等诸多问题,科学万能的神话被彻底击毁。另外,芭芭拉·沃德的《只有一个地球》,詹克明的《世上本无害虫》,罗马俱乐部的《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未来问题 100 页》,汤因比与池田大作的对话集《我们共同的未来》,卡洛琳·麦西特的《自然之死》等绿色经典著作的诞生掀起生态保护的世界性浪潮。随后,哲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等纷纷呼应这股来势汹涌的生态思潮。

哲学上,罗德曼的“生态对抗”理论、米克的“新的自然哲学”、泰勒·米勒的“绿色哲学”、奈斯的“生态智慧”、罗尔斯顿的“生态伦理学”或“环境哲学”等从不同角度将生态理论引入哲学思考中。2000 年之交,中国生态哲学和伦理学出现井喷式发展,1994 年李春秋出版《生态伦理学》,1996 年余正荣出版《生态智慧论》,1999 年余谋昌出版《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2001 年雷毅出版《深层生态学思想》,同年,李培超出版《自然伦理尊严》。

美学上,生态美学、环境美学应运而生。西方生态美学具有跨学科性和实践性强的特点,将生态美学理念运用于景观设计、环境设计、生态系统管理、可视化管理等领域,如切努维斯的《景观审美体验的本质和生态》、高博斯特的《服务于森林景观管理的生态美学》、夏庞德的《超越风景资源管理:正在形成的生态美学理论和可视化管理》,普瑞格恩的《生态美学:环境设计中的艺术理论及应用》等。国内美学界也将生态理论纳入当代美学建构中,涌现了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徐恒醇的《生态美学》、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及岳友熙的《生态环境美学》等。

社会学、政治学上,绿色政治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动向。马克思曾把哲学问题和社会学、经济学研究连在一起,认为资本主义是异化问题的根源,共产主义则是异化问题的最终解答。西方马克思主义延续了马克思的多学科思维和资本主义批判传统,指出生态问题的社会根源和经济解决途径。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生态马克思主义成果累累,如威廉·莱斯的《自然的统治》《满足的极限》,本·阿格尔的《论幸福和被毁的生活》,高兹的《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学》,帕森斯的《马克思恩格斯论生态学》,哈维的《资本的极限》,阿什顿的《绿色之梦:红色的现实》,高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

学》，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福斯特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等。他们将红色批判与绿色运动结合起来，以生态武器炮轰资本主义，提出生态问题的根源不是科技或资本家的贪欲，而是资本主义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生产方式，生态危机的最大受害者是社会底层人民，因此他们将生态保护和维护社会正义相结合，以生态运动为契机推动社会政治运动。另外，他们也批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嫁生态危机的“生态帝国主义”，将生态话语纳入后殖民主义批判当中。以中国为例，联合国报告称“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电子垃圾场”，“70%电子垃圾流向中国”，台州椒江、汕头贵屿等地因处理“洋垃圾”而承受沉重的生态灾难，^①这些生态问题不仅来自人与自然的矛盾，而且来自不同地域、民族和文化形态之间的矛盾。

经济学上，生态理念促使经济学家们广泛反思并构建经济发展新模式。丹尼斯·米都斯的《增长的极限》是绿色经济的经典读本，该书选择人口、工业发展、粮食、不可再生资源 and 污染五个决定人类命运的问题来研究人类经济增长模式对地球和人类的毁灭性灾难，不无悲观地提出人类经济发展的极限在100年内。无独有偶，加勒特·哈丁在《生活在极限之内——生态学、经济学和人口禁忌》一书中论述了人口与自然、经济、社会等诸方面的关系，认为人类对GDP增长的热切渴望不是纸上的增长，而是建立在对自然的过分掠夺和破坏之上，文明是有限度的，人类种的繁衍应有边界，主张在极限内生存和发展。书中列了这样一个公式： $\text{汤姆} + \text{杰利} + \text{自然} = (\text{汤姆} + a) + (\text{杰利} + b) + [\text{自然} - (a + b)]$ ，a和b看似人类的财富增长，但事实上不是建立在自然剥削上，就是建立在不公正分配之上，作者不无嘲讽地说，“财富在较为简单的人类观念中能被创造出来”，“财富不能繁殖——只有债务能够繁殖”。^②

在生态理念影响之下，许多经济学家们还进行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新探索，对全球产业转型提供有益思考。首先是微增长或零增长论。丹尼斯·米都斯基于增长极限的看法提出“零增长论”。加勒尔·哈丁认为开发和收益超过某个节点，不成正比，并根据收益递减定律提出经济学中的“懒惰政策”，即不适合开发的土地就不开发。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舒马赫主义”零增长式的稳态经济策略，以此减缓资本主义大生产所造成的自然危害，到八九十年代将其修正为生态、自然协同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发

① 《报告称中国成世界最大电子垃圾场，大量来自日本》，<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130614/205115795986.shtml>，2013-06-14/2014-10-01。

② [美]加勒尔·哈丁著，戴星翼译：《生活在极限之内——生态学、经济学和人口禁忌》，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00、105页。